

季羨林先生临终前关注的八个问题(上)

□ 季羨林口述 蔡德贵整理

季羨林先生生前最喜欢介绍自己的说法是：我是北大的一个教员。对外界给他的国学大师的称呼，他执意坚辞，但仍然辞不掉。他说自己连小师也不够，遑论大师？他还说自己是杂家，最多说自己是北京大学教授，东方学者，足够了。但是季先生的谦虚并不能阻止人们尊他为国学大师，新华社的讣告仍然坚称他为国学大师。

现在的问题，不是争论季羨林是不是国学大师，而是要真正了解季先生对国学到底有什么贡献。我（指蔡德贵，编者注）曾经在《探索与争鸣》杂志发表文章，探讨季先生的大国学观；但因学识所限，虽然花费大量精力来探究，也许还是不能真正揭示出季先生的国学真谛。

2008年10月1日，季羨林先生给温家宝总理写信，称自己需要一位助手，并希望我能担任他的助手。于是，从2008年10月13日起，每天下午三点多，我都要来到北京301医院，花一个多小时听季老“口述历史”。季羨林先生在病床前集中向我谈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。季先生认为，弘扬国学，就是弘扬中国文化。关于中国文化，季羨林先生临终前对包括“创建大国学”在内的八个

问题尤为关心，谨分两部分整理如下。

儒学就是宗教，但是中国宗教有别于西方意义上的宗教

口述时间：2008年10月16日下午4：00-5:10

蔡德贵：最近好多朋友关心您，问您在做什么。您口述历史的内容可以向外界透露吗？学术界的朋友都很关心您。

季羨林：这有什么保密的，不保密。

蔡德贵：您提倡奥运会，要把孔子抬出来。香港孔教学院的汤恩佳博士非常感动，他说，这个影响是他自己永远也不能达到的。他多年来在大陆捐赠了大约价值几千万元的孔子塑像，气魄非常大。他74岁，为推广孔子思想不遗余力。山东大学的孔子像也是他捐赠的。他的观点与您不完全一样。他认为孔教的教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，有教化的意义。

季羨林：也用不着那么解释，（孔教）就是宗教，在唐代就是宗教。儒、释、道三教，堂而皇之地叫宗教。这无所谓。

的失衡，即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看，世界范围的贫富两极化也越来越严重，世界经济体系越来越不合理。无论是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理论，还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，都说明了以往资本主义一体化的历史，就是财富从边缘向中心、从穷国向富国集中的历史。美元的独霸地位会形成所谓“磁吸效应”，全世界的相当一部分财富被吸引到一个国家，甚至一条华尔街。早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，就有“华尔街打喷嚏全世界感冒”的说法，此次金融危机印证了华尔街危机全世界遭殃的恶果。

从根本上说，全世界面临的的就是经济体系不合理、社会不公正的问题。尽管单靠福利体系建设难以解决如此艰难的问题，但福利制度的研究和建设也应该对此作出应有的贡献。“大福利构想”意在建立一个相对独立于经济体系的社会体系，它更强调社会体系包括福利体系的自稳定、自协调机制。例如，“大福利”搞得不好，虽然不能避免出现失业问题，但可以使失业给社会、给民众生活造成的冲击尽可能减少；“大教育”搞得不好，可以有效增强人们的竞争能力、适应能力、应付危机和化危为机的能力；

而如果有了“大保障”、“大服务”，即使面对各种风险和危机，人们也可以安然无恙；有了“大金融”更可能直接对抗和化解金融和经济风险。所以，“大福利”作为对经济危机具有防范功能的全球社会基础，是可以预期的，至少是有必要去争取的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景天魁. 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. 北京：华夏出版社，2001.
 - [2] [5] 时娜、彭超. “民工荒”倒逼产业升级提速. 上海证券报，2009.9.23.
 - [3] 张荣楠. 中国经济复苏关键看能否破解三大失衡. 上海证券报，2009.9.22.
 - [4] [6] 陆铭、范子英. 中国出口导向路径不会有根本性改变. 上海证券报，2009.9.22.
 - [7] 郑永年. 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泡沫. 参考消息，2009.5.21.
 - [8] 杨国营. 教育在改革与创新中前进. 参考消息，2009.9.15.
- 编辑 李梅

蔡德贵：汤恩佳认为，大陆对孔教有贬低，孔教就是挖掘孔子思想的教化意义。

季羨林：也用不着那么解释，孔教就是宗教。

蔡德贵：可是孔教推行起来有难度，国家不是还没有承认它是正式宗教吗？

季羨林：国家不是有宗教局吗？我跟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谈过一次话，不过不是专门谈孔教。有一次我跟冯定先生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，坐同一辆车。冯先生提出一个问题，是阶级先被消灭，还是宗教先被消灭？后来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再后来，我跟叶小文一见面，就跟他讲，你这个位置很好，在极左的时期，你这个位置要消灭宗教的，这在当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，现在呢，则要另外看待了。我跟他讲，恩格斯用了一个词，叫“宗教的需要”。这世界有的人需要宗教，有的人不需要宗教。我认为这是真的。中国人，不需要（西方意义上的）宗教。至于欧洲人为什么需要宗教，原因很简单。因为他们一出生，就在教堂接受洗礼。我在德国的时候，（西方人）到了礼拜天，吃完早点，就到教堂去做礼拜。那教堂我去过，它不限制人员进出。我去的是天主教的教堂，大堂里面挤满了人。至于他们是跪着还是坐着，我忘记了。

蔡德贵：应该是坐着，天主教好像不跪。

季羨林：那我说的就是天主教。牧师提着一盏灯，在人堆里面转，还发出声音。牧师提着灯转的情景，我现在一闭眼，还浮现在眼前。人们早晨从教堂回家以后，一般会来到城市附近的农村。有点钱的人，比如教授，都在农村买一小块地，种点东西，地边有一所木头盖的小房子，他们一天就呆在那个木头房子里。吃饭呢，木头房子有现成的，能够住，能够做饭。那时候，西方有钱人的礼拜天就是那么过的。

缅甸很有意思，首都仰光附近有一个茵莱湖。茵莱湖边上，有一些小木头屋子，人在那里面只能坐，不能躺，教授在内的有钱人家几乎都有一所小木头房子。他们一个星期在小屋里去住上半年。

蔡德贵：是不是带有宗教反省的意思？

季羨林：跟这有关系，就是反省。他们想什么，咱们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反省哪些事情做得好，对得起上帝；哪些事情对不起上帝。

蔡德贵：先生，您刚才说中国不需要宗教。

季羨林：这是我自己的观点。

蔡德贵：那您怎么解决中国唐代儒教的问题呢？唐代是把儒学当作宗教了。

季羨林：唐代是三教合一。我认为不是中国不需要宗教，而是说不需要西方意义上的宗教。西方的宗教是信仰上帝，而中国的宗教并不信仰上帝。唐代宗教三教合一，也不信仰上帝。虽然同样叫宗教，但内容不一样。

蔡德贵：那您是在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国的宗教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。

季羨林：嗯。

蔡德贵：先生，现在有观点认为，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是神学宗教，信仰的是上帝。

季羨林：对。

蔡德贵：我们的宗教是道德宗教，是让人讲究道德修养的，让人完善道德行为的。

季羨林：对。

蔡德贵：您说，有道理吗？

季羨林：有道理。

蔡德贵：所以，中国人从小不念《圣经》，但是念《论语》，念《四书》。

季羨林：其实，那就是《圣经》。

蔡德贵：《论语》就是我们的《圣经》，但是一直没有把它作为《圣经》固定下来，对吗？

季羨林：对。是这样的。

蔡德贵：您的说法，与汤恩佳先生完全一样。他说，《论语》就是中国人的《圣经》。可惜的是中间有一段，尤其是中国的“文革”，对儒家的东西冲击得太厉害了。因为孔子被打倒了，《论语》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。汤恩佳先生有一个愿望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是否可以安排他与您见一次面？

季羨林：他是政协委员啊，可以通过广东政协与中央（全国）政协联系啊。

蔡德贵：香港身份证来301，比较难。

季羨林：不知道。

蔡德贵：发扬儒教，在哪个意义上最有价值？

季羨林：不是儒教，我说的是孔子的学说，我并没有称它为儒教。唐代是宗教，三教合一。我认为孔子的学说，讲运动会，他讲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礼、乐不是运动，但射、御就是运动。射箭，开着战车，这就是运动。书、数是文化，就是六艺之学。欧洲有宗教战争，一打几百年。我不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什么宗教战争。白莲教起义不是宗教起义，而是不满的农民，借宗教来造反，所以中国没有宗教战争。

蔡德贵：可是，外来的宗教，对中国宗教的发展还是有刺激的。比方说，佛教对道教。有些学者说道教是受佛教的影响。可以这样说吗？

季羨林：一点也不错啊。道教的《道藏》，是受佛教的《佛藏》的影响。但现在国内研究《道藏》的人不太多啦。现在我们在编《儒藏》，这个是谁发起的，我不知道。

蔡德贵：汤一介先生。

季羨林：恐怕级别还要高。

蔡德贵：那可能是许嘉璐先生同意的。

季羨林：我好像还是总编撰。（笑）

蔡德贵：现在除了北京大学在编《儒藏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和四川大学也在编。交叉的、重复的内容可能都有。

季羨林：这是没有问题的。

蔡德贵：有些人说，您老研究了一辈子佛教。

季羨林：也不能那么说，我也不限于佛教。

蔡德贵：研究啊。

季羨林：研究也不限于佛教。

蔡德贵：但是您一辈子没离开过佛教研究，可以这样说吗？

季羨林：我研究佛教，主要不是从教义角度研究。我对于佛教教义，不感兴趣。对所有宗教的教义，我都不感兴趣。我觉得教义里边充满了偏见。我研究佛教语言，是从语言（方面研究的）。研究佛教的语言，我这方面的文章，写得不少。

蔡德贵：博士论文谈语尾的变化。

季羨林：嗯。

蔡德贵：是比较语言学吗？

季羨林：应该是，叫它比较语言学，或者比较宗教学也可以。

蔡德贵：您在《大唐西域记》的导言部分——

季羨林：嗯，我知道。

蔡德贵：——可是谈了不少佛教教义的。

季羨林：很长的。

蔡德贵：您对教义分析得很透。

季羨林：都忘记了。

蔡德贵：那您说，如何挖掘儒学的价值和扩大其影响？

季羨林：我们现在不是在编《儒藏》吗？现在《儒藏》是在《佛藏》和《道藏》的影响下编辑的。这件事最卖力气的大概是汤一介先生了。编《儒藏》，是从中国的经典里选一些可以入“藏”的，但到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。最近他们怎么搞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我是《儒藏》总编撰。《儒藏》还没有搞成。因为咱们儒家的著作，浩如烟海，要“藏”的话，得搞出一个次序来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

蔡德贵：用什么方法挖掘儒学的价值呢？

季羨林：当时我建议奥运会抬出孔子，因为它“六艺”里面是有体育的。他们有些人对这个很有兴趣。

《儒藏》实在是非做不行

口述时间：2008年12月10日下午3:00—4:30

张立文：季老，这是我们孔子研究院编纂的《国际儒藏·韩国编》。原来汤一介先生一再请我去主持《中华儒藏

精华》，当总编，因为我还没有退休，纪宝成校长不同意。我跟汤先生商量，我编辑国际部分的。因为您是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的顾问，所以您也是我们的顾问。

季羨林：嗯。

张立文：我们想跟温家宝总理讲讲，儒学早就该走出去了。海外儒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儒学在公元前便传播海外，成为世界性的学问。按计划，我们准备将《国际儒藏》分为韩国、日本，还有欧美等四个部分汇编。

季羨林：韩国在尊孔方面做得比我们要好。

张立文：现在他们还有乡校。

季羨林：对。汉城大学有一个奎章阁，我去看过那个地方，奎章阁藏书不多，但是很有特点。李退溪就是韩国的。《儒藏》必须做，你们做了一件好事情。

张立文：希望您支持。我们想申请一部分经费。

季羨林：可以找新闻出版总署，他们管这个事。

张立文：希望季老多支持。

季羨林：不敢当。我力量有限，尽力而为。《儒藏》实在是非作不行啦，要不然影响我们国家的面子。人家问，《佛藏》有了，《道藏》有了，为什么没有《儒藏》。人家一问，我们回答不出来。此外还得要补课，年轻人还得认识繁体字。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不认识繁体字的情况必须改变。原来我有个想法，大学一年级，不管哪个系，开马克思主义课程的同时，也开中国的国学课。不管哪个系，一年级，没有修完这个，不能毕业。我觉得应该这样。此外，过去有个说法认为，我们的《四库全书》就是《儒藏》，这个观点是不对的。当然，《四库全书》是了不起的东西，但《四库全书》不能叫《儒藏》。

张立文：现在我们缺乏古籍整理的人。

季羨林：是不容易。国务院不是有个古籍整理小组吗？周林是组长。

张立文：季老，您是我们的大树，有您在，就好说话。我们就有力量。

季羨林：大家一起来鼓吹，众志成城啊。汤一介现在在做这件事啊。

张立文：我们在一起做。汤一介那里已经出了8本了。

张立文：您有什么想法，交代给我们。

季羨林：第一个想法，就是你们做了一件好事，要不然太不像话啦。儒释道三家，我们有《佛藏》和《道藏》，唯独缺少《儒藏》，交代不过去啊。中国不是提倡中国文化吗？“藏”里面就包含中国文化。第二，当然，编撰《儒藏》的工作做起来也要慎重。日本的《大正大藏经》，国外的学者都引那本书，很方便，我也引那个书，但是它的标点，一塌糊涂，一塌糊涂不够，就“两塌糊涂”了，没有一个对的。给古籍加注标点很不容易，你看二十四史，后来一直有人挑错，特别是《元史》。《元史》的名

字本来就古里古怪的，《元史》的错，最多！

弘扬国学，从娃娃抓起

口述时间：2009年2月5日下午2：40—4：30

季羨林：现在有个提法，弘扬国学，从娃娃抓起。我写过这个字幅。

蔡德贵：您给哪个单位写的呢？

季羨林：忘记了，反正不久，去年下半年吧，很近的。弘扬国学，从娃娃抓起，我赞成这个提法。当时我有个想法，我给真正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，尤其是中年、老年的学者，提出了一个课题，就是他们平常写的弘扬中华文化的文章，都是一个调子，都是学者的调子，娃娃不懂也不适应这种调子呀。国学要从娃娃抓起，怎么抓，很难，怎么让娃娃了解什么是文化，这个工作很难。现在让我给娃娃讲文化啊，我讲不了。我们的讲法，娃娃也接受不了。

蔡德贵：北京的一些国际学校，就是采取像过去私塾的办法，让小孩先背，然后讲一些故事，效果很好。如“有朋自远方来”，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一类。中国的孩子现在采取这个办法是不是也行？

季羨林：哦，先背。对。过去我们小时候，就是学老办法，背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，这是第一步，第二步就是背“四书”了，主要是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

蔡德贵：当时韵律的小学启蒙有了吗？

季羨林：大概几百年来，传统的办法就是背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只能自己背，里面的内容老师讲不了。比如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”这个问题就非常复杂。他怎么讲得了呢？“天地玄黄”后来改过“天地元黄”，为什么改元呢？因为康熙不是叫玄烨吗？玄改成元，这一改，面目全非。天地玄黄，包含很大的学问，中国的开天辟地的历史，就是天黄地黑。老百姓对开天辟地的知识，就是天是黄的，地是黑的，这本来是基本的概念。但是玄改成元，就没有法子讲了，完了，面目全失了。再比方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“性本善”只是儒家一点的观点。

蔡德贵：您小时候背过不少东西。包括《书经》，您都背过的。

季羨林：我们那时候就是背。即便老师要讲，如果没有一个大学教授的水平啊，也讲不了里面高深的含义，所以只能背，私塾老师怎么讲得了呢？上面讲的中国历史上对开天辟地的看法，私塾老师他连知道都不知道，怎么讲啊？还有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这只是一派的看法。还有人并不认为性善，荀子就讲性恶，这也是儒家。

蔡德贵：荀子在稷下学宫当了祭酒，相当于大学校

长，他吸收了齐文化的因素，尤其是淳于髡的影响，淳于髡是他的老师。由于文化交流的结果，荀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，就是吸收齐文化的因素。

季羨林：当年我们念书的时候啊，学生也不问，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”，就是背，背得多了，你慢慢就懂了。

蔡德贵：那时候教师的法宝是打板子。而我们现在却规定不能体罚学生。

季羨林：嗯。其实老的教育方法，也有它的好处。背了再说，慢慢就懂了。

蔡德贵：背还是有好处的。您从小背过好多中国古典。您这一辈子，背很多书，多背点有好处。

季羨林：有用处。所以我现在有个看法，现在年轻孩子啊，多背点书，有好处，特别是多背点诗，年轻孩子最少能够背几十首诗。我背的诗不少，甚至于到后来很长的像《长恨歌》，都能背，当然现在不行了。《琵琶行》，当时都能背。我们那时候到了高中，写文章都是用文言文。

创建大国学概念^①

蔡德贵：您多次呼吁创立大国学，您在给袁行霈的信中，更为明确地指出：国学，实际上是中华文化的同义词。您也曾应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之邀，为《中国通史》题词：“普及中国史，提倡大国学”。您为什么要提倡“大国学”？

季羨林：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。按我的观点，国学应该是广义的“大国学”的范畴，不是狭义的国学。既然这样，那么国内的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化，就都包括在“国学”的范围之内。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，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。齐鲁文化互补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但是齐鲁文化以外，其他地域文化也很重要。过去光讲黄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中心，我是不同意的。长江文化和其他地域文化，其实都应该包括在国学里边。敦煌学也包括在国学里边。

国学的发展不是封闭的，其发展离不开文化交流。文化交流有两种形式，一个是输出的，一个是进来的。敦煌学是进来的代表，很多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的文化，都到过敦煌。佛教从国外进来，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变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。敦煌学里边有很多内容是佛教的，也有其他文化的，是古代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最后一站，再往下就没了。吐火罗语的《弥勒会见记》剧本，是不是也算国学？当然算，因为吐火罗文最早是在中国新疆发现的。吐火罗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语言，是别的地方没有的。

很多人以为国学就是汉族文化。我说中国文化，中国

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份。中国文化是我们国内 56 个民族共同创造的，这 56 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围。而且通过文化交流，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里的外来文化，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。

我们现在的国学研究还很粗糙，很多应该包括的内容还没有挖掘出来。弘扬国学，绝不是复古。任何事情都是要前进的，国学也要前进，里边的精华要保留，也难免有一些糟粕，那就去掉。总之要向前看，不要向后看，向后看的目的是为了向前看。传统文化不断发展，外来的文化不断地融入中华文化之中，这是没有时间界限的。儒家、道家是传统文化，佛家也是啊，把佛家排除在外，这是不对的。

蔡德贵：几十年来，您的研究涉及到国内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化。早在 1984 年，您就应上海戏剧学院的邀请在该院戏剧文学系作学术报告，虽然主题是着重介绍印度的戏剧文化，但在讲到中国的戏剧历史时，您提出特别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戏剧历史的研究。您还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了繁荣满族学、蒙古学和朝鲜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。能否结合您的研究谈谈“大国学”的内涵？

季羨林：出版界，过去出过的好多中国哲学史、中国文学史、中国医学史著作，这个“中国”大都是汉族的，满族的东西沾一点边。这是不对的。我说脑袋里想着中国，就必须想着 56 个民族。每个民族的发展都不一样，当然其中的汉族总体发展程度最高，其次就是满族。过去讲五族共和，满族在第二，是对的。满族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，但就是不缠脚，很了不起。过去写过不少文章，探讨缠脚的历史，也有歌颂小脚是莲花的，说潘妃“步步升莲花”，小脚不是莲花，小脚怎么能是莲花呢？踩在地上，怎么是莲花？讲潘妃“步步升莲花”，我就不赞成。满族很了不起，什么都学，就是不学缠脚。

满族学，按理应该说是“吾家事”，中国国境以外没有聚居的满族。但是，研究满族语言、文学、文化、风俗、习惯等等的学问，在眼前的中国和世界，实在是不景气。满族一入主中原就开始汉化。虽然有几个皇帝看到了这个危机，努力加以匡正，但似乎收效甚微。到了近代，清代统治结束，研究满文的学者，更为稀少。西方汉学家中间有旁通满文者，比如德国的 w.Fuchs、Haenisch 等等。日本过去也有专门研究满文的学者，如今西龙、今西春秋等等。在中国，建国以后范老（文澜）曾开办过满文学习班，邀请当时尚健在的满文老专家授课。后来据说由于老专家谢世，从而停办，后遂无问津者。

蒙古学是世界学说，是世界蒙古学。在汉满蒙回藏里边，蒙古学在世界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，是显学。各国几乎都有蒙古学专家。到现在也是世界显学。原因也很简单，蒙古当时统治了半个世界。蒙古征服的地方很多，涉及的语言也很多。研究蒙古学的队伍，国内好像还没有，

尤其是有成绩的，在世界上占有地位的，还没有。蒙古民族曾创建过历史上最辽阔的横亘亚欧两大洲的大帝国，成为历史上的奇迹。到了近代，蒙古学从欧洲兴起。这门学问研究难度极大，它牵涉到众多的民族和语言，一时成了显学，欧洲出了一些著名的蒙古学家。清朝末年，此风传至中国，以洪钧《元史译文证补》为首的许多汉文著作出现了。后来陈寅恪先生也在这方面写过一些论文。一直到今天，研究蒙古史者，尚不乏人。我们虽然有掌握汉文资料近水楼台之优势，但通晓与蒙古史有关的众多的语言文字，则远逊西方学者。不用说超过西方学者，就是想同他们比肩，也尚有待于我国学者极大的努力。

至于朝鲜学，做好这一件工作，并不容易，应该广泛探讨与朝鲜文有关的古今语言文字，仔细对比，认真加以科学的分析，然后提出初步的大胆的假设，在这个基础上，再继续探讨，最后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。中国的朝鲜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，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具有向心力。在历史上，朝鲜半岛也出现过分分合合的局面；朝鲜族在文化交流方面也做出过贡献，唐代有很多高丽僧赴印度留学。他们一方面吸收中国佛学，另一方面又把佛教传入日本。后来他们又传入了宋明理学，并加以发扬光大。

蔡德贵：您曾为张至善、张铁伟翻译的阿里·阿克巴尔的《中国纪行》写序，肯定“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，穆斯林的作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，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”。

季羨林：我的朋友白寿彝，本人是回族。白寿彝当时雄心勃勃，有个计划，搞一个千万字的《中国通史》。“回”泛指的就是穆斯林啦，信仰伊斯兰教的。它包括国内十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。阿拉伯国家对世界的文化交流啊，有很大的贡献。比如这个糖，糖英文不是 sugar 么，都是从梵文来的。世界的糖史，就是糖的历史，有 2 本，一本是德国人写的，我借过；一本是用英文写的。德文写的那本啊，材料多，比较谨严。英文写的那本，很潦草，反正关于中国的那一部分，几乎全是错。杜环的《经行记》，我用过。那时候唐朝周围的少数民族啊，文化几乎没有，尚武，打仗行。唐朝时代的呢，就是打仗打不过他们。

咱们研究西域啊，比较晚。这方面的书啊，只有向达的《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》讲的多一点。那时候，长安那个地方啊，有点像后来的上海，各种民族都有。当时当然是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。

蔡德贵：您一直支持对藏学做研究，您从 1946 年在北大创办东语系之后的第三年，就聘请于道泉到系任教。于道泉又和原来已经在东语系的王森先生以及金鹏、韩镜清几位同事，创办了藏文专业，开始招生。第一次招生虽然只有两名学生，却使藏学这一专业在高等学府内正式立足，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

季羨林：我曾经在《一点希望——致藏学研究中心》

的信中说，在全世界范围内，藏学已经成为显学。欧、美、日本许多大学里都设有专门研究机构，对西藏的历史、宗教、语言、文学、民俗、艺术等等，进行深入细致认真严肃的研究，已经取得了累累的成果。世界各国研究佛教者几乎更是非通藏文不行，因为藏文里保存了大量印度梵文佛典的译文，原文已佚，汉译佛典中也找不到，不通藏文，研究就难以进行。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。藏学的根源当然是中国西藏。我国藏族有长久的文化传统，藏学研究也有悠久的历史。汉族文学者中也有不少对西藏的语言、文字、宗教、历史发生兴趣的。近年来，他们写了大量水平很高的专著和论文。这当然又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。

同世界各国研究藏学的水平相比，我们当然是占优势的。但是，我们也有不足之处。对此我们决不能执行鸵鸟政策，或者视而不见，这是自欺欺人的行为，为我辈所不应取。论藏文使用水平，外国学者当然不如我们。但是论辅助条件，论科学的研究方法，则外国藏学研究者又往往超过我们。我们决不能夜郎自大，固步自封，鹤鹑饮海，井蛙观天。这样是绝无进步可言的。据我个人的看法，我们最大的弱点是对于国外研究情况不甚了解，信息极不灵通，甚至连想了解的愿望都没有。国外藏学研究的专著和杂志也十分不全。这是非常危险的，是阻碍我们科学研究进步的。当今之计，我们必须广通声气，急起直追，而且需要汉藏两族的学者密切协作，携手共进，取长补短，决不能划地为界，自立营垒。能做到这一步，我国的藏学研究就能大踏步前进，为这一门学科开辟新天地，大放异彩，无愧于我们伟大国家的声望和地位。密宗应该是藏学的重要内容。

藏学跟印度的关系更为密切。藏文使用的字母，是婆罗米字母演化的。婆罗米字母是和田那个地方使用的。藏文的字母就是从和田的婆罗米字母演变出来的。“贝叶经”不是藏学，什么经都可以写，贝叶就是我们没有见过

的一种什么树，也不是叶子，一种树啊，大概底下有一块（可以当作“纸”），当时没有纸，在上面写字，就叫贝叶经。贝叶经不一定是佛教经典，因为当时的贝叶就是“纸”，写什么就是什么（其他经也可以写在贝叶上）。因为佛经东西多，所以大多数贝叶经都是佛教的经典。但是不能一听贝叶经，就以为是佛经，不一定。

蔡德贵：您在主编《敦煌学大辞典》的时候，“敦煌学”一条由您亲自执笔，可见您很重视敦煌学。

季羨林：“敦煌学”这个名词，是陈寅恪先生最先使用的，其涵义比较笼统，凡研究与古代敦煌有关的学问，都可以称之为“敦煌学”。特别是有名的莫高窟和19世纪初（或18世纪末，相差不过一年）发现的藏经洞，其中图籍琳琅满目，成为全世界许多国家学者研究的对象。“敦煌学”之名因之日彰。至于“吐鲁番学”这个名词，始作俑者恐怕就是不佞自己，它泛指研究古代新疆文化的学问。因为吐鲁番地区考古发掘工作做得比较多，成果比较大，所以就以“吐鲁番学”概括全疆的研究工作。其中并没有多少玄妙之处。敦煌吐鲁番学具有六个方面的价值：第一，对研究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价值；第二，对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价值；第三，对研究语言学、音韵学的价值；第四，对研究宗教问题的价值；第五，对研究古代科技及其他方面的价值；第六，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价值。

敦煌的意义啊，得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。世界文化是东西传递的，从东方传到西方，从西方传到中国，这中间就是丝绸之路。丝绸之路在世界文化史上，占很重要的地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世界文化啊，无非两大重点，一个是中国文化，这个不用说了；另外一个古代的希腊、罗马文化。世界别的地方没有产生这么重要的文化，而这个文化交流的通道，就是丝绸之路。敦煌的文书，除汉文写本外，粟特文、佉卢文、回鹘文、吐蕃文、梵文、藏文等各民族文字写本约占六分之一，可见敦煌是文化交流的集大成者。新疆地区更是多种语言、多种宗教、多种文化在这里广泛传播与交流，有汉文、梵文（古印度）、吐蕃文（古藏文）、回鹘文（古维吾尔文）、于阗文、粟特文、龟兹文、希伯来文、突厥文、吐火罗文等等。

龟兹学也包罗在国学的范围。龟兹本来就是古印度、希腊—罗马、波斯、汉唐四大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处，自汉代以来设立的“西域都护府”、“安西都护府”相继设在龟兹。敦煌学自然也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。此外，2005年在田阳举行第四次壮学学术研讨会，我曾发去贺信表示支持。

注 释：

① 此部分根据季羨林先生临终前的多次口述综合整理而成。



季羨林在授受蔡德贵提问

编辑 叶祝弟